

危险的愉悦：早期美国华侨赌博问题研究 (1850—1943 年)

潮龙起

(暨南大学 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关键词] 美国; 移民研究; 华侨; 华工; 赌博; 排华法; 华侨堂号

[摘 要] 论文勾勒了早期美国华侨的赌博情形, 分析了他们参赌、设赌的各种原因和社会危害, 探讨了华侨社会、中美两国政府对华侨赌博问题管理和控制的效能。作者认为, 早期大部分美国华侨热衷于赌博, 主要是赌博为特定历史场景中的华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方式, 被他们视为实现黄金梦的一条捷径。经济利益的驱动致使华侨热衷开设赌馆, 也使华侨堂号勾结警察, 暴力护赌。赌博对美国华侨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 它使一些华侨不能履行自己对家庭的义务和责任, 还引发了吸毒、盗窃、“堂斗”等其他社会问题。在控制赌博的行动中, 由于华侨社团和中国驻美领事权力有限, 威望不高, 而华侨赌商和堂号与美国警察互相勾结, 致使禁赌行动难有成效。

[中图分类号] D634.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 (2010) 02-0041-13

Dangerous Pleasure: Gambling in the Early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of America 1850 - 1943

CHAO Long-qi

(Department of Histor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igration studies;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labors; gambling;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verseas Chinese Tongs or factions

Abstract: FAside from depicting the gambling activities in the early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of America, this article examines various factors and negative social impacts behind the social problem while discussing how people to deal with it and whether such a management or control was effective.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ep indulgence in the bad habit among majority of early Chinese migrants was that gambling could provide Chinese migrants in the particular historical scenario with an important way for socializing, and it might become a shortcut for them to realize their dream of fortune. Driven by the economic gains, early Overseas Chinese were keen on establishing gambling dens while the Chinese Tongs colluded with local police and protected the gambling activities with violence, resulting in great harm to the Chinese society in America. Some of the Chinese migrants thus failed to fulfill their obligation and duty towards their families. Meanwhile, it triggered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drug addiction, burglary, and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Chinese Tongs. The curb and

[收稿日期] 2009-11-12

[作者简介] 潮龙起 (1964—), 男, 江西九江人, 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社会史和华侨华人研究。

control over the Chinese gambling were largely failed due to the weakness of local Chinese 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consulate, not to mention the collusion among the Chinese gambling business operators, Chinese Tongs and local American police.

直到二战前,由于美国华侨经济能力有限,美国当时又制定和实施排华法,限制华人移民,歧视在美华侨,再加上中国传统社会观念的约束,华人女性移民美国极少,致使在美华侨男女比例长期严重失调。^[1]在这样一个缺少女性和家庭的单身汉社会中,很多美国华侨无法像正常人那样,在精神上享受男欢女爱及天伦之乐,因而多沉湎于吞云吐雾的烟馆,呼卢喝雉的赌馆,或是云朝雨暮的妓院之中,吸毒、赌博、嫖妓等陋习成为畸形社会里华侨消解乡愁和忘却劳累苦闷的“良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早期美国华侨的娼妓、烟毒、械斗等诸多越轨性社会问题已有不少研究。^[2]但对赌博问题的研究则显得薄弱,不少论著对此虽有提及,然而目前尚未形成专论。笔者长期关注华人社会问题,在此,拟根据近年来收集的中外文报纸、笔记等资料,对早期美国华侨赌博问题进行梳理,并试图以此透视早期美国华侨社会经济生活的若干侧面以及当时美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华侨社会的管理与控制。

一 早期美国华侨的赌博情形

自19世纪中叶美国加州发现黄金后华人大量赴美开始,直到1943年美国取消排华法的近一百中,美国华侨的赌风较为盛行。早期美国华侨赌风之源头,可追踪到他们的故乡——珠江三角洲地区。对于近代广东地区赌博的情况,已有大量记载。道光年间,周寿昌在《思益堂日札》中写到:“粤人好赌,博之术多途。曰番摊馆,摊钱为戏,设馆招客,如列肆然。”^[3]又据《清会典事例》载:“粤东赌博之风,甲于他省。”^[4]侨乡方志对此也有记载。1934年编纂的《恩平县志》就写到:“赌风之盛以吾粤为最,如番摊、白鸽票、闹姓、铺票、山票、牌九种种,名目不胜枚举。”^[5]

实际上,大多数广东移民来美国前就学会了赌博。在远赴太平洋彼岸的漫长旅途中,一些移民就以赌博打发时间。他们一登上旧金山码头,就把家乡的赌博习俗带到这个城市。对于早年美国华侨赌博的情况,已有很多记载。1855年出版的《旧金山编年史》就载有旧金山华侨赌博的情况:“萨克拉门托街北端尽头,全是华人开设的赌场,聚赌的人们在这里熙熙攘攘,不分昼夜。”^[6]1876年,一位华侨在加州参议会前作证说,旧金山市估计有华侨赌馆200间,萨克拉门托约有12间。^[7]久居美国的华人刘伯骥也在其著作中提到:“1885年,当其盛时,(旧金山)约有七八十间,每间每星期向警察纳贿五元。……1880年间,旧金山市华人最著名的赌商,有新宁陈天申,不只操纵华埠赌业,即加州各地的赌馆,亦引为有力的领袖,华人以赌业为生者多推崇之。”^[8]光绪末年,出洋考察大臣戴鸿慈也说:“旧金山素称藏垢纳污之藪,华人居此者将三万人,大都皆下流社会也。无赖之徒,恒以赌为业,甚或潜聚赌而科敛其头钱,与衙役朋比为左右手,言之可叹也。”^[9]根据口述史料,在二战前的加州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农区的一些小镇,如埃灵顿(Isleton)、胡桃林(Walnut Grove,粤侨称之为汪古鲁)、洛克(Locke,粤侨称之为乐居)等,华侨赌馆林立,生意兴隆。在胡桃林镇,早期的华侨主要是筑堤工人、果园工、农工。每当假日和雨天,农工便光顾华埠的赌馆。^[10]

在美国华侨另一主要集聚区纽约及东海岸的其他地方,著名的《纽约时报》也不时报导这一地区华侨的赌博情形。1888年2月,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美国华侨赌博的长文,作者库林(Stewart Culin)是一名精通美国亚裔移民赌博的白人。该文指出纽约市有30~40家番摊公司。^[11]1891年,该市的番摊馆共计约60家,每家都生意兴隆,财源滚滚。^[12]除纽约市外,东海岸其他华侨集中区也存在华侨赌博现象。1888年2月,《纽约时报》报导费城有8家番摊公

司。^[13]该报还曾报导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 (New Haven)、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城和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华侨的赌博情况。^[14]

美国华侨的赌博方式主要有番摊、白鸽票、牌九、纸牌、骰宝等,特别是番摊和白鸽票最为流行。番摊早在中国南部一带民间就广为流行。它是一种不定期的赌博,赌法简单,易输易赢,往往一夜之间能使人倾家荡产。其赌法是,在桌子上放一大堆铜钱,或纽扣、小瓷片等,作为“摊皮”。从中叉开一小堆,用有短柄的铜制盅盖(摊盅)盖住。另以一块正方形锡片或木片(名叫“摊正”)摆在一小堆摊皮之前,任人猜买“一”、“二”、“三”、“四”。根据最后剩余的摊皮数跟猜买的数字是否相符来决定胜负。^[15]华侨赌番摊所用的硬币是中国当时流行的铜钱,由他们为赌博带进美国,数量较大。摊馆通常在下午3点和晚上8点开业,星期天和节假日是在上午11点开业。摊馆还为参赌者提供免费晚餐。^[16]

白鸽票也是美国华侨较为流行的赌博方式。它是一种古老的彩票,源于清代赌鸽,道光年间已流行于广东。供人猜买的字为《千字文》中初段的天、地、玄、黄等顺序排列下来的八十个字。赌局把《千字文》前八十个字印在纸上(即白鸽票),参赌者在票中任圈十字为一条,票厂则开二十字。其开奖方法由师爷揸字,预先选定应开的二十个字,在厂前当众悬挂,届时揭晓。其开奖方法,赌本三厘,中十字者(全中)得奖十两,中九、八、七、六、五字得奖钱数不等,中四字以下为输。^[17]早期美国华侨使用的白鸽票多从中国大量进口,它为木刻印制,五英寸见方。白鸽票赌博的输赢和赔率是这样计算的:猜中五字以下者会输掉赌注,猜中五字者是一赔二,中六字者一赔20,中七字者一赔200,中八字者一赔1000,中九字者一赔1500,中十字者一赔3000。^[18]可见,赌白鸽票的刺激更大,押中的字数越多,赢的钱就越多,且呈几何数字增长。另载,白鸽票在许多地方都能购买,其购买的价格不时在变化。票厂每天开票两次,下午是三点至四点半,晚上是九点至十点半。^[19]

设立番摊公司所需资本不多。公司各合伙人一起筹集50至200美元即可,除非公司损失特大。^[20]除老板外,赌馆工作人员包括赌馆的管理者、警卫、收银员和皮条客等。被称为“斧头仔”的警卫,把守着赌馆入口处,对可疑之人进入馆内会提出口令。他们及时向赌馆通知警察的到来,并在顾客为赌注与赌馆发生争执时参与调停。《纽约时报》曾报导,纽约市勿街(Mott Street)6号的一家赌馆门口经常看到门卫放哨,并劝诱路人入馆参赌。这名门卫有好几次看到警察前来时就发出信号,赌馆内灯火马上熄灭。^[21]而那些皮条客则在赌馆开赌时,站在赌馆门口招揽路人进馆参赌。赌馆老板每周付给他们5美元,有时一些赢家也赏给他们一两美元。^[22]

与其他华侨行业一样,华侨赌馆老板还建立自己的组织。如番摊行是华侨赌馆老板的保护性和互助性社团,有300~400名成员。每家摊馆每星期要交纳8美元,这些资金用作特别的用途,^[23]主要是打点警察、雇请律师等。

为逃避警察侦查,摊馆一般设在地下室里,它为楼上店主所有,租金每月十元以上,有时他们不收租金,而是合伙分红。^[24]一些华侨杂货店、洗衣店也附带开设赌室,或销售白鸽票。在加州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农区的一些小镇,很多华侨经营的商店,除应付正常的生意外,还负责在店里收集白鸽票,买彩票的全是华工。华侨商店经售这种彩票作为副业,彩票由赌馆经营而交店铺销售,华侨便不用往赌馆购买。^[25]

华侨赌馆规模大小不一,大者可容纳上百人,小者则能容纳十几人。前引的《旧金山年鉴》就载:华人“赌室,不妨也称‘沙龙’,通常都很小,只能摆上三张到六张桌子,也可说只有三个到六个‘庄家’。在某些大赌场的最里面还有一支五、六名华人组成的乐队,奇形怪状的乐器发出古怪的声音,使白人听起来难以忍受。”^[26]大者如1902年2月,纽约唐人街一家赌馆被警察袭击。警察发现有150多人在这家赌馆聚赌。^[27]1908年5月,纽约警察分别袭击勿街和披露街(Pell Street)的两家大型番摊馆,现场发现两家赌馆都有100名华侨。^[28]

为安全起见，华侨赌馆一般都是戒备森严，大门常用带刺的铁丝网保护起来，并用巨大铁锁锁住。馆内还有很多暗道，以便在警察突击赌馆时参赌者能及时逃脱。^[29]1912年4月，警察袭击了纽约市披露街22号、24号的赌馆。22号这家赌馆所在房屋的一层为杂货店，二楼为餐厅，三楼为住宅，地下室看起来是仓库，大门用巨大铁锁锁住。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门打开。24号房屋的地下层同样也是壁垒森严，暗道很多。^[30]

华侨赌馆设施简单，一般设有赌桌、长凳及赌博所需的其他赌具。在奥克兰，华侨番摊馆通常设有土地神，而不是关公，因为华侨认为关公太讲究伦理道德，不适合摆在这里。奥克兰华侨赌馆墙上还贴有白纸条幅，说明赌博的规则。白纸是有意义的，它象征着霉运，但霉运应属于赌徒，这样会给赌馆带来很多钱财。赌馆内所设的神牌都写在白纸上，神祇前点着一支白蜡烛，而不是通常使用的红蜡烛。下注的金额通常是固定的，且使用各种筹码来代替钱币。^[31]

华侨赌馆的参赌者来自华侨社会的各个阶层，有洗衣店和中餐馆的工人、农工、职业赌徒、流浪汉、水手、雪茄制造商及卡车司机等。如1921年8月纽约市警察在披露街抓获78名赌番摊的华侨，其中就有来自长岛的卡车司机以及在唐人街外营业的洗衣工。^[32]有些华人专门来到美国直接与番摊庄家赌博。他们一般是有经验和技巧的赌徒，来美时只有几百美元，几个月后回中国时就有几千美元。有些是吸食鸦片的流浪汉，身上只要有钱，就会参赌。还有很多没有赌博经验的洗衣工以及华侨水手和雪茄制造商都赌番摊。^[3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华侨聚集地，有不少以赌为业者。《申报》曾报导：“美国查问华工情形，中列生舟昔地方有华人一千三四百，妓馆二十八处，妓女一百四十三人；赌馆三十八处，以赌为业者约四百人；烟馆之数则未详。其言如此，夫以一千四百人往彼中，有赌匪四百，已据十分之三……”，从此数据可见该地华侨赌徒所占比例之高。^[34]另外，华侨赌馆的参赌者还有不少日本人、白人等其他民族。梁启超曾提到：“如温高华、舍路诸埠，赌客之大部分为日本人，每年贡于我者，埠各十余万。旧金山埠之番票（西人赌白鸽票者，别为赌馆以待之，与华人不相杂厕，各埠皆有），当最盛时，西人之赌金将三百万美金，今犹五十万美金云。”^[35]报刊资料对此也有记载。如，1908年5月，纽约警察袭击勿街80号的一家大型赌场，在现场发现一百名华人，还有一名日本人。这位日本人刚刚赢了176美元的筹码，想在他离开时兑换成现金。^[36]

纽约一名记者曾在一名华人基督教信徒的陪同下实地采访了纽约唐人街，发现赌博如此公开，警察可毫不费力地进入赌馆。这位记者对华侨赌馆的布置以及赌客的神态进行了细致描述：

在一个点着煤油灯的狭长房间里，聚集着40名华人，他们互相推挤，尽力挤到赌桌旁边。参赌人数一次不到10人。只要口袋有钱，他们就不会放弃自己的位置。

在桌子的一端是发牌人。在桌子中间有一堆钱，有纸币、金币和银元。桌子周围的每个参赌者一手紧握钱币，另一只手在走运时随时拿取赌注。发牌时鸦雀无声，所有眼睛都盯着桌子中间。当发牌人的摊竹抬起时，摊竹指向的那个人就会疯狂地抓住全部赌注。

然后大家兴奋地喋喋不休说一阵子，十多只手伸上前来，在中间又垒起一堆硬币。很快，发牌人的手忙个不停，牌一洗好，又开始发牌了。然后，说话声嘎然而止，一片寂静，直到摊竹再次举起为止。^[37]

以上是对美国华侨赌博的盛况、赌博方式、赌馆的开设和经营、参赌人员以及具体的赌博活动的概观性描述，从中可见早期美国华侨赌博业的兴旺，赌博成了部分华侨生活的一部分。

二 早期美国华侨赌博问题的成因

（一）社会心理的需要

为什么早期大部分美国华侨热衷于赌博呢？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首先是赌博为特定历史场景中的美国华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方式，满足了他们娱乐、社交和情感等方面的需

要。实际上,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赌博是一种简便的娱乐活动,而不是一种罪恶。由于早期来美华侨大多为单身汉,无法像常人那样享受男欢女爱和家庭的天伦之乐,为消解在异乡的苦闷,他们在工作之余就聚集一起,以输赢不大的赌博来消磨时间。特别是在排华时期,他们的社会生活被严格限制在唐人街内,而早期唐人街的文化娱乐设施又比较缺乏,因此,像吸食鸦片和光顾妓院一样,赌博成为他们日常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且比他们在家乡时更为重要。库林就认为,美国华侨比他们在中国时赌得更频繁,原因是他们连根拔起,与祖国缺少联系,但又不允许成为美国大社会的一部分。^[38]1878年4月,名叫阿莫(Ah Moo)、阿利(Ah Lee)、阿生(Ah Son)的三位华侨,被法官宣判为违犯赌博法而获刑后,向最高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他们申辩说,他们没有犯下所说的罪行或者违反纽约州的法律,他们只是沉湎于一种社会娱乐消遣活动,而不是赌博。最后,最高法院给予他们人身保护令,将他们释放。^[39]《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的作者,著名作家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在1894年写过一篇题为《圣路易斯华人》的轰动性报道,记述了华侨赌博的情况:^[40]

当一位圣路易斯的华侨需要放纵自己时,他就带上必要的资金,漫步到华尔纳特街与市场街之间的南八大街去(即圣路易斯城中心的华人聚居地)。他在这里寻找一切机会处理他这个星期所挣的工薪或所赚的利润,或者是他的洗衣店——因为在这个街区已有无数的洗衣店输去赢来。每个星期天的午后,这个城市的所有洗衣店都关门歇业,很快,各种车辆开始把华人带到南八大街。一些人步行来这里。到两点时,已有几百名中国佬来此,以一种华人特有的方式玩得快乐不已。整个下午和晚上,人进人出,但从未减少。当一位华人赌番摊输光了,立刻就有另一位华人抢到的位置。

可见,对大部分华侨,特别是那些散处在唐人街外的华侨来说,经过一周辛苦劳作及枯燥和寂寞的生活后,一到休假,他们就来到唐人街。在这里,他们可以会晤老乡,了解家乡近况,吃上中餐以及参与其他的社交活动。他们也与老乡一起赌博,试试运气。对他们来说,唐人街是他们社会娱乐活动的中心,他们不仅从此得到心理安慰,找到自我归属,而且它所提供的赌博等活动,使他们在身体上可以得到放松,精神上获得刺激、兴奋和快感,从而消解身心的疲劳。

其次,对于早期美国华侨来说,赌博似乎是他们实现黄金梦的一条捷径。19世纪中叶加州黄金的发现,对华南地区民众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珠江三角洲地区民众抱着“黄金梦”,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即使在“黄金热”消退后的若干年,他们仍相信在美国苦干年后,就可以发财致富,衣锦还乡,安度晚年。他们到美国不久就会发现,这种幻想是不现实的。但他们仍然抱着快速发财的梦想,而赌博似乎提供了一种机会,让他们尽快脱贫致富。在他们看来,像番摊、白鸽票这样的赌博活动无需任何技巧,输赢完全靠运气和机会,这是赌博吸引他们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排华时期,几美国华侨受到美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严格限制,很难有机会通过自身努力而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于是他们往往选择赌博作为自己的出路,否则就根本没有发财的指望。而且他们还因对赌博输赢的期盼而产生一种悬念、一种新的体验和希望,它满足了那些生活循规蹈矩的华侨的情感需要。华侨参赌者持有人人机会均等的信念也维持着他们对地位和报酬的期待,这些是他们最为看重而又无法通过惯常渠道而获取的。

(二) 经济利益的驱动

从赌馆经营商的角度来分析,开设赌馆能获取暴利,这是一些华侨热衷设赌的一个原因。摊馆老板的主要收入是“抽头”或“抽水”。投买者中了彩,不能全得,摊馆要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维持费,通常为十分之一。^[41]1870—1920年,奥克兰摊馆的抽头是彩银的7%。^[42]白鸽票厂也通过“抽水”获取利益,其做法是票厂从兑奖者的彩银中扣除5%作为“花红”;如果白鸽票是通过代理商销售,那么要从兑奖者的彩银中扣除15%作为“花红”,其中10%归代理商所有。^[43]对于这一点,颜清湟在论述近代新马华人赌博时曾精辟地指出:“当他们嗜赌成瘾后,他们总是

输家，只有赌馆和这一制度才是赢家”。^[44] 据载，就是一些小番摊公司每天的平均利润都有 5 美元。^[45]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加州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的农区小镇，华侨赌馆工作人员的收入每天达两美元，而赌馆老板的收入远远超过此数。^[46] 实际上，美国华侨“靠开赌场及白鸽票为生者亦不少”。^[47] 在旧金山湾区直接间接靠白鸽票为生者，约有三四千人，皆视为正常事业。^[48]

赌博之利所在，也引起堂号分子的参与。由于早期美国警察的腐败以及单身汉华侨对赌博这种不法消费的大量需求，促使了各堂会向这种利润丰厚的地下经济渗透。一些堂会分子热衷经营赌业，或为华侨赌馆提供武力保护，以收取保护费。1883 年的一份《纽约时报》曾报导纽约安良堂大佬李希龄（Tom Lee）利用纽约华人特别代理治安官的身份，向赌馆勒索保护费的细节：

自三年前李希龄被任命为特别代理治安官以来，不仅自己开赌场，而且也给其同胞发执照开赌场和烟馆，经营白鸽票……只要有华人来到这个城市，他就去他们那里，展示他的徽章，说他是代理治安官，熟悉所有的法律。如果他们每周为每张番摊桌向他交纳 5 美元，他就给予他们执照，让他们经营赌场，赌牌九，或者只为娱乐而无违法的其他游戏。由于新来者不懂法律，且看到李有徽章，就向他交纳费用。其他开杂货店、洗衣店的华人，受到其同胞赚大钱的诱惑，抛弃原有职业，在李的同意下，开起赌场。勿街一度有 37 家赌场，李一年从中收取 1.2 ~ 2 万美元……这时，一位名叫杜喜（Doo Hop，音译）的人，在勿街 17 号开了一家赌场。在李的请求下，他被警察抓捕。由于他拒绝向李交纳保护费，李就控告他开赌场，而那些交纳保护费的赌场则安然无恙。杜喜在直到两个月前的三年中，每周给李 5 美元，以获取经营赌场的特权。另一位证人在法庭还作证说，除了对赌场征费外，李还迫使白鸽票厂老板每周支付 10 美元。^[49]

不受堂号保护的赌馆持续不了多久，堂号迫使这些独立赌馆歇业的方式很多。如果各种骚扰都不能使它们歇业，暴力威胁就会出现。堂会从赌馆中获取了暴利，每天获取的金钱达好几千美元。^[50] 一些堂号头领大发横财，如旧金山的三邑人冯正初，就是“堂口巨头，百万富翁”，曾创设“至善社”堂号，“勒索银饷，经营偏门，串通警方，查封四邑人所开之赌馆妓寨，以遂其独家垄断之谋，并曾一度控制赛马事业。当时收入，已达月进十万元之巨，成为华埠‘赌王’”。^[51] 1905 年，由于受到向华侨赌场老板勒索保护费的指控，有“唐人街市长”头衔的李希龄被捕。根据举报，李收取 95 张赌桌的保护费，拥有六家洗衣店和四家香烟厂。^[52] 可见，李通过经营赌场、保护赌馆所积累的个人财富之巨。因此，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华侨堂号勾结警察，暴力护赌，也是推动华侨赌业兴盛的一个原因。

早期美国华侨赌博的兴盛还与为赌馆提供场所的房产业主有很大关系。许多妨碍治安的房产，包括经营赌馆的房产，为商业界、金融界和政界重要人物所有，如众议院影响法案委员会（Rules Committee）主席达尔泽尔（John Dalzell）、美国阿拉斯加事务顾问华琛（David T. Watson）、匹兹堡著名律师戈登（George B. Gordon）等。根据记录，华侨在这些房屋中经营赌业多年。^[53] 可以看到，这些属于政界、商界名流的房产主因得到赌馆老板的租金，而对华人赌博抱着视而不见的态度。

三 早期美国华侨赌博的社会危害

从有关史料来看，早期美国华侨中广为流行的赌博习俗，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首先，在 19 世纪后期，由于国内劳动收入很低，而移民美国费用昂贵，把旅费、利息和办理移民证件的费用加起来，约需 200 美元，这在国内干活不吃不用要十年以上才能攒够，所以一般民众难以承受。^[54] 因此，当时很多人赴美都是举全族之力，在整个家族的精心安排下才得以实现，一般以家庭或家族中身体健康的成年男子为优先考虑对象，并对跨国家庭中各自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了明确界定：美国华侨有义务给家庭汇款，赡养家中的父母和妻子儿女，妻子则留在家中照顾公婆，抚

育子女。但是一些华侨赌博成瘾后，嗜赌如命，不务正业，忘却自己对家庭、家族和社会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据载，很多华侨洗衣工、水手和雪茄制造商都年薪可观，利润颇丰，但因好赌，而将这些血汗钱都输在摊馆。^[55]弗兰克曾在《漫游中国南部》一书中提到，那些在海外积累一定财富的华侨，在动身回国前就在旧金山把钱输掉。^[56]当时华侨出国，本是为了挣钱偿还债务，接济家人，但却因赌博输钱，不能担负这一责任；甚至还有很多华侨因赌博输光，一再推迟归国的期限；更有些华侨因赌博破产，一生都无力回国，而客死异乡。据载，在美国排华时期，普通华工要花十几年时间才有足够经济能力回国结婚，而在加州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农区的一些小镇，有些华工永远无法回国娶亲，原因之一是由于耽于赌博，缺乏资金。^[57]还有一些华商因赌破产，而连累侨胞。据载，李光（Li Kwong）不仅是纽约华人雪茄制造商协会主席，还是一家大型餐厅和一家新式华侨公寓的所有者，人们估计他拥有价值一万美元的财产。由于相信他经济可靠，许多勤劳的华侨将他们的积蓄存放他那里。由于李光后来在勿街摊馆赌博，输得很惨，最后被迫变卖财产，避债潜逃。他潜逃时所欠债务多达几千美元，债务人主要有杂货店主、肉店老板和面包师等。他负债潜逃，致使许多华侨陷入穷困，有些债主由于悲哀过度几乎垮掉。^[58]梁启超在20世纪之初游历北美时曾详细记录当时华侨赌祸所造成的这一后果：“无业者居一大部分，此实最怪异之现象也。此等无业者之中，其年老不能做工又不能归去者，约十之一。其余壮而游手者，约十之九。彼等何以为业？则赌其一大宗也。在美洲之华人，几无复以业赌为耻者，谨厚君子亦复为之，真可异矣。以华工所入，每人每年平均可得千金，然其能贲以返国者，不及十之一，皆赌害之也。”^[59]晚清使美大臣杨儒奏称“查华人寓美，洋人指为风俗之害者约有三端：一曰鸦片，一曰赌博，一曰械斗。……赌博出售白鸽票，每日早晚开彩两次，输赢以千万计，工商经营所积，半耗于此，恒有丧资沦落不归，以致流为窃盗者”。^[60]可见，不少华侨因为赌博，一生也没有实现在美国发财致富、衣锦还乡的梦想，一些华侨甚至终生贫困而老死美国，连其落叶归根的愿望也是在华侨会馆的帮助下实现的。^[61]

针对华侨的赌博陋习，美国警察不时袭击华侨赌馆，没收赌款，收缴赌具，处以罚款或短期监禁。对此，《纽约时报》曾有大量报导。1883年10月，纽约布鲁克林区一家华侨赌馆被封，14名华侨被捕，640美元现金当场没收。^[62]1887年1月，纽约富尔顿街566号一家茶叶店遭警察袭击，74名赌番摊的华侨被抓，大量赌具被缴，每人携带的资金从7美元到700美元不等，也被没收。^[63]1887年2月1日，《纽约时报》以《富有的华人赌徒》为名，报导一名来自旧金山名叫洪华（Hong Wah，音译）的赌徒腰中藏有7000美元现金。这家被警察袭击的赌馆老板因被控开设赌馆，需要支付1000美元保证金以获取保释，其他人每人罚款2美元。^[64]根据美国有关官员于1931年在旧金山的调查，该市逮捕违法的华人，共有6113人。其中重大犯罪为38人，涉毒犯为146人，其余5350人犯有赌博罪。^[65]可见，除赌博输钱外，警察经常性地袭击赌馆，没收赌资赌具，处以罚款或短期监禁，也使赌商和赌客经济蒙受损失。

赌博给华侨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以致其辛苦所得因赌而失，不能汇款回国赡养家眷，履行其在跨国家庭分工中应承担的责任。对此，侨乡妇女一再告诫远在美国的丈夫：

诚郎须自重，勿入博场中。

番摊最易累人穷，牌九斗牛都莫弄。

猛惺忪，听从奴劝奉。

若是痴迷仍在梦，楼房田地总成空。^[66]

一些华侨赌博上瘾后，也意识到赌博对家庭等造成的不良影响。当时流行于华侨中的歌谣就反映出他们忏悔的心情和改过的决心：

贪心不遂愿，输落三几年。

累及拙荆悲涟涟，问心无颜相见面。

即刻变，改过而迁善。

前日想头真讨贱，从今尽听老婆言。^[67]

但有些华侨仍然嗜赌如命，成天抱着一种希望，就是通过最后一赌来赢回他们过去所有的损失，以还清他们对家庭和朋友欠下的债务。结果却未能如愿，正如前文梁启超所言的一些华侨“其老不能归者”，一生也没有实现衣锦还乡的美梦，而是穷困潦倒地老死在异国他乡。

赌博也助长了一种社会风气，使很多华侨好逸恶劳，放弃正业，而指望完全靠赌博提供的运气不劳而获。有些赌徒穿着潇洒，出手大方，生活奢侈。据载，纽约唐人街华侨中有三百名纨绔子弟。他们看起来像悠闲的绅士，但他们比那些日夜辛勤工作的华侨熨衣工赚到更多的钱，也能享受更好的生活。他们鄙视任何体力劳动。他们虽然没有赌场老板那样生活奢华，但他们的服饰都是从广州进口过来的，吃的是上好的食物。^[68]

华侨赌博还引发了吸毒、盗窃等其他社会问题。不少赌馆附设烟室，或开设在烟馆附近。1900年9月《纽约时报》曾报导该市披露街21号一家摊馆的情况：“摊馆后面是吸食鸦片的地方，那些赌博输钱、心情沮丧的人会在这里寻找安慰。他们很快把自己丧失理智的事情抛到一边，拿起烟棒吹起来，直到愉快地忘却自己离开赌台时身无分文的难过心情。每天晚上几乎都是同样的人，日复一日。他们输掉钱，然后就去吸鸦片，第二天早晨人们就发现他们在整个城市的洗衣店里。他们只要手头上赚到钱，很快又回到赌场。他们从未赢”。^[69]前文征引的《申报》曾对生舟昔地方华侨娼赌的情况进行评论说：“是以六分工作之人而供四分娼赌之费，工费所得安望其能尽为己有乎？一旦所得尽丧，能不取非其有，其不流为盗贼者鲜矣，又何怪土人有所藉口也。”^[70]可见时人对当时华侨赌博等陋习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表示担忧。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赌馆与相互竞争的秘密堂会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常会引起激烈的“堂斗”。在奥克兰，历史上最著名的堂会有秉公堂、萃胜堂和萃英堂。一些赌馆或白鸽票厂的所有合伙人及工作人员都属于同一堂会的成员，而其他赌馆或白鸽票馆则代表另一堂会。可以推想，这样就必然导致相互猜疑。堂会向其成员收取入会费、会员费等，以便训练这些卫士，为烟、赌、娼这些非法经营提供保护。而卫士的一项任务就是要保护他们所在的赌馆不被敌对堂号成员所侵夺。^[71]20世纪早年的匹兹堡华埠，两个对立的秘密会社，时常为争赌客，或为赌桌上的欺诈嫌疑而火拼。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一场“堂斗”，从1924年10月一直持续到1927年3月，前后达两年半之久，造成无数死伤。^[72]另据1926年的《申报》报道，加利福尼亚州的华侨两堂会，因争夺赌博的管理权，双方“互争已久，因此发生枪杀案。自去年七月份以来，丧生者共十七人”。^[73]

可见，为了谋取暴利，社团堂号在经营赌馆等黑色经济或为其提供保护而收取保护费的过程中，势必造成各社团堂号间的一种竞争局面，以致最后各方诉诸武力，这是导致华侨堂号间堂斗频繁爆发的一个主因。1900年被委任为纽约唐人街便衣巡警的维克菲尔德（George R. Wakefield）警官认为，赌博的迅速发展，客观上为敌对的华侨帮派迅速崛起创造了条件，因嫉妒而引发好几起暗杀案……堂斗因为赌馆的经营者为彻底控制赌业而爆发，敌对的两个帮派是安良堂和协胜堂，两者都自称有数千成员和高效的组织领导。^[74]一位名叫弗兰克·李（Lee Frank）的华商代表在请求纽约警局查禁唐人街赌博时说，堂号从一种在异乡聚集同胞的、和平的兄弟结拜组织演变为一种在各种癖好掩盖下谋求非法利益的组织，主要归因于赌业。协胜堂和安良堂之间的冲突大都涉及应该由哪个堂号处理从番摊、牌九和白鸽票中获取的佣金问题。从一开始，唐人街的赌博就存在保护问题。堂号因此获取了一定的保护费。他还保证，纽约华商会给出的反对赌博证据表明，很多赌馆都代表了前述两个堂号的利益。^[75]

对于华侨社团“堂斗”与烟、赌、娼等地下经济之关系，调处美东六堂大联斗的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在1930年8月呈报国民政府的文中写得很清楚^[76]：

侨界中胡为有此怪现状耶？一言蔽之，烟赌而已。庇烟庇赌，勒收私规，日积月累，财源无尽。于是一堂号之建筑，费美金数十万；一年度之用款，达美金百余万。其组织非常之完密，其领袖非常之尊严。分堂不下二、三十处，会众不下一、二万人。豢养一般无赖（斧头仔），平时则包烟包赌，有事则寻仇呈凶。杀人者赏美金数千，等于克服城池之懋赏；被害者给美金一万，优于特任官吏之恤金。其斧头仔无异陆军之常备军；其争烟赌，无异军阀之争地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又况事故发生，可以藉端糜费，如讼费恤金之类，以饱少数人之囊橐。故堂号领袖，往往兴风作浪，以利其私，此堂斗之原因也。

因赌博而发生的利益冲突导致堂斗不时爆发，对华侨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危害。这一点，清政府出使大臣及驻美领事、美国地方当局等屡有提及。伍朝枢在上述呈文中写到：“窃以堂斗一事，为旅美华侨特有之恶习，相言四、五十年，残杀同胞，貽羞国体。”^[77]司徒美堂也说到“堂斗”造成华侨的死亡人数：“旧金山牺牲华侨百余人，纽约牺牲华侨 200 余人”。^[78]而据谢英明回忆，“到 1926 年止，因堂号之间相互械斗而致死的侨胞最少在 300 名以上，伤者过千，损失财物更是无法估计。”^[79]

华侨因赌博而引发的“堂斗”不仅直接造成华侨生命财产损失重大，而且还牵累无辜华侨，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影响。20 世纪初，纽约协胜堂与安良堂为争夺赌博利益而爆发的堂战断断续续，枪击事件不断，以致唐人街生意低迷。美国人一到唐人街就感到紧张，他们生怕一不小心就被子弹射中。^[80]一些对华人抱有敌意的警察，肆意逮捕华人，无故关闭华人店铺，袭击华人住所。1915 年 10 月，纽约唐人街的业主向警察投诉说，警察肆意殴打无辜华人，而且如果他们坐下来，静静地玩起牌九时，就有一大帮警察朝他们围捕过来，搞得唐人街鸡犬不宁。^[81]

再者，华侨赌博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还给美国排华分子以排华口实，不利于华侨在美国的生存和发展。对于二战前的美国主流社会来说，烟馆、赌窟、妓院、堂战等似乎是唐人街的主要特色，赌博、吸毒、嫖妓、打斗等似乎就是华人的天性。一些媒体为了迎合公众的猎奇心理，大肆渲染华人的这些恶习以及华人的暴力和神秘色彩，投机政客也在各种场合重复这些论调，致使公众对华人形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这为排华分子提供了口实。梁启超曾将当时流行的反华论调归纳为二十条，其中一条就是：“金山大埠唐人街，归官查阅之时，则有神庙十三所，坚守门户之赌馆百五十间，不秩序之屋（原按语指妓馆）百零五间”。^[82]可见赌博对华人社会带来的严重影响。

四 早期美国华侨赌博的社会控制

从上述分析来看，早期美国华侨的赌博引发了种种社会问题，引起了华侨社会、中国驻美使领馆以及美国当局的关注。它们试图采取措施，限制或禁绝华侨的赌博行为。首先，在华侨社会内部，由于早期大多数美国华侨为单身汉，缺乏家庭的约束，因此要实现禁绝赌博，只能依靠华侨社团的力量。一些华侨社团向美国警局呼吁，希望警察采取行动取缔赌博，并提供唐人街赌馆的有关信息。如 1913 年 8 月，纽约华商会（the Chinese Merchants's Association）数十人来到唐人街附近的区警察局投诉，希望警局采取行动，根绝唐人街的赌博活动，以恢复一种良好的商业环境。华侨代表中有十人准备作证，说勿街和披露街共有二十家赌馆。警察局可根据这个信息，将唐人街赌馆铲除掉，保证堂号经常签订而又很快破坏的和平条约的延续性。^[83]由于纽约唐人街赌馆众多，生意兴隆，促使这一地区物业租金上涨过高，致使一些合法生意歇业，或被迫迁往他处，或兼营赌博等不法生意，引起了华侨社团的不满，他们请求当地警局采取行动，铲除赌馆。^[84]一些华人青年还自发组织起来戒赌。1884 年 1 月，一位华人青年建立一个组织，告诫华人青年不要受勿街番摊的诱惑。会员入会费每人 5 美元，并发誓从不赌博，并对违反者处以 50 美元以下的罚款，且为会员举办一场宴席。该组织已有几百名成员，其中有几名戒赌者。^[85]在控制

华侨赌馆的竞争，一些弱势堂号在不能依靠自身力量获取赌博利益时，也试图通过美国警察来干扰和破坏其敌对堂号所控制或经营的赌业。如在纽约，安良堂势力较大，通过保护或经营赌馆，获利很多，引起其竞争对手协胜堂的嫉妒。协胜堂成员试图敲诈赌馆老板，但这些老板对他们置之不理。当他们看到这样不能获利时，就决定向警察局举报，让摊馆关闭。^[86]美国传教士以及一些社会改革者也呼吁禁止华人赌博，整治社会风气，维持社会秩序。

但是，相对堂号和赌商的势力而言，这些组织的力量是脆弱的。前文提到的旧金山市最著名的华人赌商为新宁人陈天申，而根据1934年宁阳会馆主席撰写的《宁阳会馆事略》载，“光绪十七年，（宁阳会馆）乔迁于天后庙街，由陈天申君着手购地”，可知陈为华侨社会的上流人物。^[87]像前文提到的、有“唐人街市长”称号的安良堂大佬李希龄（Tom Lee）财大气粗，会众广布，势力强大，纽约唐人街对其无可奈何。

在禁赌和开赌这两种势力的较量中，美国警察的态度显得特别重要。在华人赌博问题上，美国警察态度暧昧，玩弄手腕。一方面，应华侨社会和其他社会人士的呼吁，他们有时袭击赌馆，查处赌博，其目的有二：一是以其禁赌行为表现其忠于职守、履行职能的良好形象；二是让华人赌商明白，在没有得到警察默许和庇护的情况下，华人赌商的损失不可避免。1891年10月，在警察袭击纽约唐人街赌馆后，华人赌商协会就发出告示，要求各赌馆提高“抽水”比例，并将这一告示张贴在赌馆内。赌商协会还派人到各赌馆检察该会这一条例的落实情况，对拒绝遵守的赌馆处以十美元的罚款。^[88]实际上，赌商协会之所以要求赌馆提高“抽水”比例，主要是为了筹集资金打点警察。可见，警察袭击赌馆是一箭双雕。另一方面，由于禁赌影响到华人赌商和堂号的利益，因此他们设法通过贿赂，收买警察，而在警察方面也与赌商互相勾结，收受馈赠，彼此因以为利，即使是高级警官亦在勾结之列。对此，已有大量资料记载。1886年12月，纽约市三位警官接受审判。其中麦克莱（McCullagh）警官犯有渎职罪，他允许华人赌博，且当对华人赌馆采取行动时，麦克莱警官就通风报信，让赌馆暂时关门；当整治行动停止后，他就给出暗示，赌馆可继续营业。^[89]1889年5月，有四名华人控告该市以乔治·威尔金斯（George C. Wilkins）警官为首的六区警察局为保护华人赌馆而每周接受固定津贴。华人每周为每台赌桌交付5美元。这个地区有二十家华人赌馆，警局每周收取一百美元保护费。^[90]1894年6月，一位在美居住14年的华人在法庭作证说，纽约警局给予唐人街经营摊馆的权利，以此勒索钱财。他说，位于勿街18号的一家摊馆就在李希龄办公的房间里。^[91]

堂号头领因为涉赌大发横财，警察局的一些官员也得到一定赏钱。堂号头领和警局官员对此都心照不宣。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警察甘当赌馆的保护伞，对华人赌馆网开一面，或在警察袭击时为其通风报信。事实上，只要有人在警察局对唐人街赌博进行控告，赌馆就在24小时内关闭，直到警局对此进行调查，不能证明它们存在时，又复业。^[92]

一些警察认为，华人赌博又不像酗酒、吸毒和卖淫嫖娼等问题那样，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直接的危害；而且由于警察不熟悉华人语言和习俗，不能确定他们是在赌博还是娱乐，有时折腾半天，最后还是被迫放人。^[93]因为华人都用筹码代替现金，有时赌注很大，成百上千，但警察跑去却见不到任何现金，无从下手。^[94]因此，这些警察在没有接到举报时，总是对华人赌馆听之任之。可见，美国警察以权谋私，接受贿赂，包庇赌馆，加上不谙熟华人赌博习俗，致使地方当局对华人赌博的控制不力。

19世纪70年代，在一些洋务派有识之士的呼吁和美国外交官员的推动下，清政府开始在美国遣使设领。据出使美国大臣杨儒载“中国自设官外洋以来，凡所规划，大抵御侮之意多，自治之意少；历久相沿，只有辩驳外人之词，颇鲜诤诫吾民之语。”^[95]可见，早期清政府遣使设领主要是与居住国政府交涉，保护华侨合法权益，而没有关注华侨社会内部的问题。这一状况直到后来才渐有改变。针对华侨社会中存在的赌博等社会问题，当时中国驻美领事和侨团侨领采取措

施，教育华侨团结自爱，劝谕华侨禁赌，并对违法者给以严惩。如杨儒在奏折中先讲到华侨赌博等恶习为美国厉禁华侨来美提供了借口，接着提出了革除华人赌博等诸弊的办法。他说“革除之道，一在申明律例。查赌博、械斗二事，绳以中国法纪，国所难宽，即按之西国科条，亦无可免。现拟饬领事官会商美国地方将此二事有犯必惩，……如屡犯不改，准其驱逐出境，或解回中国治罪。一在详示教条。……烟赌、械斗各弊，华民习为固然，且疑与目前限制之故毫不相涉，若非详加开导，未易使之悔悟改图。现拟饬领事官每逢朔望，就各埠会馆宣读圣谕广训，为之讲解，勉其各安生理，勿作非为。因将烟赌、械斗之害，条分缕析，苦口劝戒，略如内地乡约之法，俾诸工商渐知愧奋，互相规勉，期于去此痼疾，力图自拔。若使行之果效，固足变侨众浇漓之俗，即未克遽效，亦减少洋人厌薄之情。此皆治本之法，宜宽筹以岁月者也。”^[96]然而，因驻美外交官的权力有限，威望不高，得不到华侨应有的尊重。如伍廷芳在1908年到波士顿唐人街时，几被华侨喝打。^[97]1924年安良堂与协胜堂发生争执，纽约领事馆调停无效，施肇基公使谓会商两堂领袖，只求堂斗不使蔓延至美京而止。^[98]一些外交官还利用职务之便，贩售烟土。如1929年，中国政府驻美国金山副领事高英之妻，利用公职旅外免检之便，私运鸦片赴美，在入关边检站为人所查获。^[99]

这种情况必然导致他们无力控制华侨社会，禁赌的实际效果不大。实际上，直到二战爆发，美国华侨积极投入战事，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以及战后大量华人妇女的到来和更多家庭的团聚，华人赌博的问题才得到缓解。

本文勾勒了早期美国华侨的赌博情形，分析了他们参赌、设赌的各种原因和社会危害，探讨了华侨社会、中美两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管理和控制的效能。笔者认为，赌博是早期美国华侨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也是当时美国华侨存在的一种社会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可弥补我们对美国华侨认识的一些空白，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加系统、全面地把握早期的美国华侨社会。更重要的是，它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管窥早期美国华侨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实况，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以及华侨社会的运作机制。此外，早期美国华侨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以及包括赌博在内各种社会娱乐等，也都是我们管窥早期华侨社会整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窗口。

[注释]

- [1] Judy Yung, *Unbound Feet: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 18; [美] 令狐萍:《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 [2] 如 Benson Tong, *Unsubmissive Women: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0; Diana L. Ahmad, *The Opium Debate and Chinese Exclusion Law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West*,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2007; 潮龙起:《试析早期美国华侨的“堂斗”》,《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等。
- [3] (清)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九,岳麓书社,1985年,第252~253页。
- [4] 《清会典事例》,卷八百二十七,中华书局,1991年,第1011页。
- [5] 余丕承修、桂站纂:《民国恩平县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504页。
- [6] [26] Frank Soule, John H. Gihon, Jim Nisbet, *Annals of San Francisco: Containing a Summa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Discovery, Settlement, Progress,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California*, New York D. Appleton & Co., 1855, p. 382, 引自吴景超:《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0页。
- [7] Shih-Shan Henry Tsai,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9.
- [8] 刘伯骥:《美国华侨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年,第120页。
- [9]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0页。
- [10] [25] [46] [57] 梁静源:《美国华工田园生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年,第34、36、93、112、39页。

- [11] [13] [20] Stewart Culin, "Chinese Gambling Games", *The New York Times*, Feb. 5, 1888.
- [12] "Fan-Tan Games To Reopen: The Chinese Looking For A Return Of Old Amusements", *The New York Times*, Feb. 24, 1892.
- [14] "A Chinese Gambling Den Raided", *The New York Times*, Dec. 28, 1885; "Chinese Gamblers Arrested", *The New York Times*, Aug. 16, 1886; "Fan Tan in Hartford", *The New York Times*, Dec. 10, 1888; "Crusader After Dalzell", *The New York Times*, Apr. 16, 1910.
- [15] [17] [41] 卫恭:《广州赌害:番摊、山票、白鸽票》,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九辑,1963年刊印。
- [16] Stewart Culin, "Chinese Gambling Games", *The New York Times*, Feb. 5, 1888; L. Eve Armentrout Ma, *Hometown Chinatown: The History of Oakland's Chinese Community*, New York: Garland Pub, 2000, pp. 49 – 50.
- [18] Stewart Culin, "The Gambling Games of the Chinese in America", *Philology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y*, Vol. I No. 4, 1891.
- [19] [37] [50] [69] [92] "Gambling In Chinatown", *The New York Times*, Sep. 9, 1900.
- [21] "A Chinese Gambling – House Closed", *The New York Times*, Oct. 6, 1883.
- [22] [33] [55] [68] [85] "Three Hundred Chinese Dudes: A Glance Into and Around The Gambling Dens In Mott-Street", *The New York Times*, Jan. 21, 1884.
- [23] "Fan-Tan Games To Reopen: The Chinese Looking For A Return Of Old Amusements", *The New York Times*, Feb. 24, 1892.
- [24] [38] [45] Stewart Culin, "Chinese Gambling Games", *The New York Times*, Feb. 5, 1888.
- [27] "Chinese Gamblers Raided, Many of Them Escaped by Climbing Down the Water Pipes", *The New York Times*, Feb. 3, 1902.
- [28] "Raiding In Chinatown, Two Fan – Tan Games Broken Up and the Colony Scared",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8, 1908; "Shot Into A Policy Gam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3, 1908.
- [29] "500 See Chinatown Raid: Sightseers Watch Police Descend on Alleged Gambling House", *The New York Times*, Nov. 6, 1919.
- [30] "Chinese Spy Slain in Pell Street Den", *The New York Times*, Apr. 7, 1912.
- [31] L. Eve Armentrout Ma, *Hometown Chinatown: The History of Oakland's Chinese Community*, pp. 49 – 50; Stewart Culin, "Chinese Gambling Games", *The New York Times*, Feb. 5, 1888.
- [32] "Chinatown of Old Flashes And Fades", *The New York Times*, Aug. 28, 1921.
- [34] 《申报》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 [35] [59] [82]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3、133、167~170页。
- [36] "Shot Into A Policy Game, Detectives Fall Down a Chute Into Chinese Gambling Den",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3, 1908.
- [39] "The Alleged Chinese Gamblers", *The New York Times*, Apr. 26, 1878.
- [40] Theodore Dreiser, "The Chinese in St. Louis", *The St. Louis Republic*, Jan. 14, 1894, Huping Ling, *Chinese St. Louis: From Enclave to Cultural Commun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3.
- [42] [71] L. Eve Armentrout Ma, *Hometown Chinatown: The History of Oakland's Chinese Community*, pp. 49, 53.
- [43] Stewart Culin, "The Gambling Games of the Chinese in America", *Philology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y*, Vol. I, No. 4, 1891.
- [44] 颜清湟著,粟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226页。
- [47] 生活书店编译所编:《海外的感受》(上册),生活书店编译所,1933年,第401页。
- [48] [65] [87] 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第628、629、197页。
- [49] "Tom Lee Loses His Place, Complaints That He Has Bothered His Countrymen", *The New York Times*, Apr. 25, 1883.
- [51] [美]三邑会馆史编委会:《旅美三邑总会馆史略》(1850—2000),旧金山:1999年印行,第186页。

- [52] “Chinatown’s Mayor Now In Police Toils , Arrested on Charge of Extorting Money from Gamblers” , *The New York Times* , Apr. 27 , 1905.
- [53] “Crusader After Dalzell” , *The New York Times* , Apr. 16 , 1910.
- [54] June Mei, “Socioeconomic Origins of Emigration: Guangdong to California , 1850 – 1882” , *Modern China* , Vol. 5 , No. 4 , 1979.
- [56] Harry A. Franck , *Roving through Southern China* , New York and London: Century , 1925 , p. 315.
- [58] “A Victim to Fantan , Many Chinese Mourn the Flight of Their Banker” , *The New York Times* , Jun 28 , 1885.
- [60]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四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1438~1439页。
- [61] 谭雅伦:《落叶归根:新会1893年义冢札记》,《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潮龙起:《试析二战前美国华侨的乡土认同》,《理论学刊》2006年第7期。
- [62] “A Chinese Gambling Hell” , *The New York Times* , Oct. 2 , 1883.
- [63] “Chinese Gamblers Raided” , *The New York Times* , Jan. 31 , 1887.
- [64] “Wealthy Chinese Gamblers” , *The New York Times* , Feb. 1 , 1887.
- [66] [67] 《金山歌集》(二),旧金山:大光书林,1915年印行,第7页。
- [70] 《申报》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 [72] 吴剑雄:《海外移民与华人社会》,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3年,第198~199页。
- [73] 佚名:《因赌博问题引起之加利福尼亚华侨互争已和解》,《申报》1926年11月8日。
- [74] William H. Snyder, “Bloody Chinatown Tong Wars Born of Gambling ‘Racket’ , New York Inspector Recalls” , *St. Petersburg Times* , Sep. 10 , 1937.
- [75] [83] “Chinese Traders to Fight Gambling” , *The New York Times* , Aug. 2 , 1913.
- [76] [77] 《少年中国晨报》1930年9月4日。
- [78] [97] 中国致公党中央研究室编:《司徒美堂》,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第53、239页。
- [79] 谢英明:《旅美见闻杂忆》,《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九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
- [80] “2 Killed from Ambush in Chinatown Battle” , *The New York Times* , Jan. 25 , 1906.
- [81] “Too Many Police , Chinatown Complaint” , *The New York Times* , Oct. 23 , 1915.
- [84] [88] Jeffrey Scott McIlwain , *Organizing Crime in Chinatown , Race and Racketeering in New York City* , 1890 – 1910 , Jefferson , NC: McFarland , 2004 , p. 108.
- [86] “Fan-Tan Games To Reopen: The Chinese Looking For A Return of Old Amusements” , *The New York Times* , Feb. 24 , 1892.
- [89] “Three Captains On Trial” , *The New York Times* , Dec. 21 , 1886.
- [90] “Blackmail by the Police: Protecting Chinese Gambling Houses in Philadelphia” , *The New York Times* , May , 17 , 1889.
- [91] “Four Chinese Gamblers Captured” , *The New York Times* , Jun. 28 , 1894.
- [93] “Chinese Gamblers Punished” , *The New York Times* , Sep. 23 , 1879.
- [94] “Chinese Trade Unions” , *The New York Times* , Dec. 8 , 1884.
- [95] [96]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四册),第1439、1439~1440页。
- [98] 《中华会馆议案簿》,民国十三年七月七日,转引自刘伯骥著:《美国华侨史续编》,第650页。
- [99] 《驻金山副领事高英夫妇贩售烟土案》,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7页。